

金元興替之際山東益都李氏家族研究綜述（1934-2015）

A Review of Research on the Li Family from Yidu, Shandong During the Jin-Yuan Transition (1934-2015)

寧 波（Ning Po）*

金元興替之際是中國古代歷史上一個重要的社會轉型期。成吉思汗建立的大蒙古勢力由漠北草原延伸至中原地區，金朝原有的統治秩序陷入混亂，金朝末年山東地區爆發了聲勢浩大的紅襖軍起義。以李全為首的山東益都李氏集團是紅襖軍中一支重要軍事力量。益都李氏首領持續了三代，先是李全，繼為楊妙真，最後是李璫，李氏父子佔據山東半島達半個世紀之久，處於南宋、金、蒙古三方政權紛爭之中。在論金元之際北方漢族軍閥割據活動時，益都李氏家族是非常值得重視的一支。忽必烈在削平益都李璫勢力之後，隨即調整對山東地區的統治政策，剝奪山東世侯權力，組建漢軍萬戶府，使其成為南下滅宋以及統一全國後鎮戍地方的重要軍事力量。因此，要研究山東區域史、宋蒙戰爭史、元初政治史，這一問題顯然是不能忽視的。

自上世紀 30 年代以降的近八十年來，山東益都李氏家族的研究逐漸受到重視。上世紀 90 年代以後，隨著研究的深入，學界對益都李氏家族的研究問題取得了突破性進展，並取得了相當豐碩的研究成果，但對李氏家族研究的學術史回顧則尚存不足，本文將對近八十年來

金元興替之際山東益都李氏集團的研究進行梳理，以期展現學界關於金元興替之際山東益都李氏家族研究的現狀。

一、關於「紅襖軍」李全集團

關於紅襖軍李全集團問題，在各種通論性著作中有概括介紹，稱不上深入的研究。¹ 民國初期陶希聖對宋代各種暴動的關注開「紅襖軍」李全集團研究之先河，但陶先生將「紅襖軍」的運動當作宋代眾多暴動中的一種來加以敘述，對「紅襖軍」李全集團未有進一步的探研。²

上世紀 50 年代至 80 年代初，李全集團在紅襖軍中的軍事活動，曾經是中國古代史和農民戰爭史研究領域中一個比較熱門的問題。從現有的研究來看，這一時期學界關於紅襖軍李氏集團的學術研究，大多集中於在階級對抗理論指導下，對被壓迫階級叛亂問題的研究。

蘭州大學趙儷生進行農民戰爭史研究中涉及到這一問題，1954 年其在〈南宋金元之際山東、淮海地區中

*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人員。

1 任崇嶽，《中國社會通史·宋元卷》（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白壽彝，《中國通史·五代遼宋夏金時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德]傅海波、[英]崔瑞德著，史衛民、馬曉光譯，《劍橋中國遼西夏金元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

2 陶希聖，〈宋代的各種暴動〉，《中山文化教育館季刊》1934.1。

的紅襖忠義軍》一文中，³指出山東紅襖忠義軍活動性質和作用的複雜性，考察了紅襖軍在金境內的活動，詳細分析它們與其他幾個政權之間的關係，對於我們深入瞭解益都李氏集團的活動有一定借鑒意義。值得注意的是，趙文認為李全一貫是忠義的，明顯帶有「革命意識形態」的痕跡，對於李全的評價問題不免有失偏頗。

李春圃、何林陶對趙文分析南宋政府與紅襖軍之間複雜關係應予以肯定，認為對於李全的評價問題，有進一步研究的必要，考察指出李全早期活動值得肯定，其建立的割據政權，是影響當時南宋金元之際三方政局的重要力量，叛宋投蒙，不再堅持「祖國立場」，成為蒙古南侵的幫兇。⁴

1956年，臺灣學者孫克寬考察義軍興起原因，認為宋廷與忠義軍之間的矛盾，使得漢人難以合力抗禦蒙古，甚至丟失了原已經收復的領土。⁵此後在其所著《元代漢文化之活動》一書中，再次談到山東紅襖軍的問題，堅稱李全集團有民族意識，想在南北之間造成一個第三勢力中間路線，與一般寇盜的性質，不盡相同。⁶1961年錢君曄發表《試論紅襖軍反金抗元起義》的論文，討論了紅襖軍李氏起義的原因及其鬥爭的正當性，進一步論述了它的特點和作用，值得我們進一步探究。⁷

上世紀70年代，日本學者大島立子《金末紅襖軍について》、池內功《李全論》二文，對南宋金蒙古交戰時期李全領導紅襖軍過程進行了詳細探討。⁸1978年梁太濟在考察漢人地主武裝興起的條件、政治動向、作用、

職能、內外矛盾和削奪經過等方面內容時，引用《鶴山先生大全集》卷16《直前奏事箚子·貼黃》，說明「李全成了左右山東局勢，同金和蒙古並列的強大勢力」。⁹

上世紀80年代初，學界又有多篇文章發表。吳泰在分析紅襖軍起義原因及性質時指出，「金朝末年的紅襖軍起義，雖然階級鬥爭的性質明顯，但是，由於金朝統治者不斷強行括取漢族人民的土地，撥給女真族猛安謀克戶，製造民族矛盾，……紅襖軍起義也顯然同民族鬥爭聯繫在一起。」¹⁰張博泉在《金代經濟史略》一書中也對紅襖軍叛金的原因、特點及對金代經濟的影響作了一些探討。¹¹1985年喬幼梅通過對猛安謀克土地佔有制與紅襖軍起義關係的考察，「仇撥地之酷，睚眦種人」，詳細分析土地問題正是導致紅襖軍起義的根本原因。¹²

趙儷生在《紅襖軍史事補記》一文中對「紅襖軍」李全集團問題有新的探索，承認三十年前與高昭所寫《南宋金元之際山東、淮海地區中的紅襖忠義軍》時，文章中有不確切之處。文中將紅襖軍探討的焦點置於「當時宋、金、元三大勢力角逐之下，農民軍不可能不表現為『叛順無常』的這個問題上來。」¹³將紅襖軍的活動劃分為四個階段，很有參考價值。

上世紀90年代以後，隨著研究的深入，學界對益都李氏集團的研究問題取得了突破性進展。鑑於「紅襖軍」李全集團對宋廷順而復逆，降附於蒙，使舊時正統史家和現代農民戰爭史研究者都對他們進行了全面否定。關於李全歸而復叛的原因，學界討論較多，仍有爭議。主

3 趙儷生，〈南宋金元之際山東、淮海地區中的紅襖忠義軍〉，《文史哲》1954.4。收入《趙儷生文集》（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2002），頁211-224。

4 李春圃、何林陶，〈關於李全的評價問題〉，《歷史教學》1955.6: 23-27。

5 孫克寬，〈元初李璫事變的分析〉，《大陸雜誌》1956.8。

6 孫克寬，《元代漢文化之活動》（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68）。

7 錢君曄，〈試論紅襖軍反金抗元起義〉，《天津師範大學學報》1961.1。

8 [日]大島立子，〈金末紅襖軍について〉，《明代史研究》1974。[日]池內功，〈李全論〉，《社會文化史學》1977.14。

9 梁太濟（到何之），〈關於金末元初的漢人地主武裝問題〉，《內蒙古大學學報》1978.1: 23。

10 吳泰，〈試論金代各族農牧民的反抗鬥爭〉，《中國農民戰爭論叢》第3輯（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1），頁379。

11 張博泉，《金代經濟史略》（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81）。

12 喬幼梅，〈猛安謀克在中原的土地佔有制與紅襖軍起義〉，《中國農民戰爭史研究集刊》第4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頁94-102。

13 趙儷生，〈紅襖軍史事補記〉，《中國農民戰爭史研究輯刊》第4輯，頁91-93。

要有如下四種認識：

一是南宋政策失誤。黃寬重從民族意識的角度分析了山東「忠義」由投宋轉投蒙的原因，正是南宋政策上的失誤，導致了不少山東「忠義」歸而復叛。¹⁴ 黃氏後續發表文章補充指出，「到宋末，抗金武力增強，宋廷恐義軍難制，實施眾建政策，分散義軍勢力，並利用正規軍來鎮壓義軍。由於政策執行者的昏庸無能、處置乖方，「義軍問題也成了政爭的工具」，導致義軍紛投蒙古。¹⁵ 孫業耀、謝剛闡述探討了「就當時歷史條件看，他實在是一個受害者，是一個值得同情和肯定的歷史人物。」「宋朝逼使李全背叛。」李瓊和他的父親一樣，頗有「忠義」之氣。¹⁶ 謝剛的碩士論文「金末元初山東世侯李氏本末考」，對李全、楊妙真、李瓊的基本史料、事蹟，依次做了超越前賢且比較系統的梳理論述，但是在史料收集與解讀方面似還稍有欠缺。¹⁷

南宋在山東「忠義」上失誤的相關研究，相關的論文還有符海潮〈南宋政府對山東忠義的控制機制〉，¹⁸ 盧渝寧〈宋蒙（元）兩淮戰場析論〉、段玉明〈李全與「李全叛宋」〉二章內容，均收入胡昭曦、鄒重華主編《宋蒙（元）關係研究》中。俞暉、俞兆鵬專門分析，「李全個人私欲和政治野心的惡性膨脹固然是其蛻變的主觀原因，而南宋統治者在處置李全問題上的錯誤則是促使李全蛻變的重要客觀原因。」¹⁹ 熊燕軍從南宋軍事防禦體系視角撰文指出，南宋甯宗、理宗之際，「就江淮戰

區而言，……置江淮制置大使，合江淮防務為一。」²⁰ 這一調整很快即見成效，李全之亂很快被平定。彭峰的碩士論文「李全亂亡事件再研究」，從軍事角度上對李全事件進行系統剖析，將李全的亂亡與南宋當時的軍事區域佈防結合起來研究。²¹

二是李全個人因素。屈小強認為「李全的悲劇不僅屬於他個人，也屬於產生他的那個農民階級。」「宋、金、蒙三大勢力的角逐擠壓下到底未能保持住晚節，這是令人扼腕的。李全的悲劇說明：無產階級產生以前的中國舊式農民戰爭是很難擺脫最終失敗的厄運的。」²² 黃寬重《南宋時代抗金的義軍》一書相關章節對此亦有闡述，指出民族意識與個人利益，這二種力量的消長，正是義軍變質的原因。²³ 繼而撰文深入考察，正是因為李全以及其所領導事業的傳奇性與複雜性，對於這一人物及事蹟的研究，在學界探討農民戰爭問題時受到了重視。²⁴ 孟祥才認為「在宋、金、元三個分別代表漢、女真和蒙古民族政權激烈角逐整個中國統治寶座的鬥爭中，李全等領導的紅襖軍依違縱橫其間。」「導致他命運如此變幻的推手是個人利益至上的考量。」²⁵ 李迎春則將李全列為金末元初漢人地主武裝之首，仍強調其階級立場的變化，並未提出新觀點。²⁶

三是經濟利益與政治抉擇。傅衣凌談到，對李全叛宋而降元有兩種解釋。其一，「認為李全有企圖獨佔蒙古貿易的野心。」其二，「認為李全或看出南宋的腐敗，

14 黃寬重，〈晚宋朝臣對國事的爭議——理宗時代的和戰、邊防與流民〉，《臺灣大學文史叢刊》50（1978.2）：164。

15 黃寬重，〈從塢堡寨到山水寨——地方自衛武力〉，《南宋史研究集》（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頁377。

16 孫業耀、謝剛，〈論李全降蒙的原因〉，《安徽史學》1997.4：29-32。

17 謝剛，「金末元初山東世侯李氏本末考」（上海：復旦大學碩士論文，1998）。

18 符海潮，〈南宋政府對山東忠義的控制機制〉，《殷都學刊》2005.4。

19 俞暉、俞兆鵬，〈南宋統治者處置李全問題的錯誤及其原因〉，《江漢論壇》2012.4：121。

20 熊燕軍，〈南宋中晚期江淮戰區的空間調整與李全之亂〉，《韓山師範學院學報》2013.2：50。

21 彭峰，「李全亂亡事件再研究」（上海：上海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3）。

22 屈小強，〈紅襖軍領袖李全的悲劇〉，《文史知識》1990.1：26。

23 黃寬重，《南宋時代抗金的義軍》（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8），頁237。

24 黃寬重，〈宋代變亂研究的檢討〉，《南宋軍政與文獻探索》（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0），頁225-308。

25 孟祥才，〈利益考量下的悲劇——評李全、楊妙真〉，《淮陰師範學院學報》2013.3：360-392。

26 李迎春，〈金末元初漢人地主武裝初探——以今山東、河北地區為例〉，《渤海大學學報》2011.5：104-108。

已不能負起統一中國的使命，故去而轉求於蒙古，這亦與其前之去金降宋同出一轍」。²⁷ 黃寬重不久改變了自己的觀點，認為李全之亂是李全在宋金蒙政局變動的情況下，就經濟利益和政治利益所作的抉擇。「從個人在世變中的角色與抉擇著眼，藉李全父子近六十年的活動事蹟，以瞭解李全興起的背景，其締造割據勢力與抉擇均與經濟利益有密切關係，因此也注意經濟利益割據勢力的影響。」²⁸ 思路與傅先生大體一致，內容上則強調南宋財賦對李全的重要性。姜錫東對李全這一群體進行考索鉤沉，「分析他們對南宋、金朝和蒙古政權的向背態度，認為這些領導人出身不同，成分複雜；最高領導人身邊都有參謀團隊，其決策非一人所為；他們對宋、金、蒙古政權的態度確實多變，但變中有不變；錢糧、武力、尊敬是決定其政治選擇的三大要素，而在當時，武力是第一位的。」²⁹

四是民族意識、國家觀念淡薄。趙文坦的研究對益都李氏集團的民族意識、國家觀念有所揭示。他對李壇之亂、貞祐兵災與紅襖軍有無關係等問題試作辨析，指出紅襖軍首領叛降不定，「一方面與南宋等三方對紅襖軍的態度和招降政策有很大關係；另一方面，山東淮海一帶的漢人在金朝統治下已經百年，其民族意識和國家觀念皆已淡薄，……益都世侯李壇統領的軍隊是大蒙古國的地方軍；元世祖中統三年發生的李壇叛亂，並非紅襖軍活動的一部分。」³⁰ 此外，他還根據文獻史料，考察益都南山兩片摩崖石刻的內容，分析它們與紅襖軍的關係。指出摩崖石刻反映了「紅襖軍領袖們是當地人心目中的英雄。」³¹ 陳智超詳細辨析「紅襖軍」、「山東

忠義軍」、「山東義軍」三種稱呼，指出山東義軍是個涵括範圍較大的稱謂，前兩種稱呼不同，它甚至包括了金朝為鎮壓「紅襖軍」而由地方官組織招募的義軍和當地地主土豪組織的義軍，而山東「紅襖軍」也有部分被分化投向這一隊伍。³² 黃寬重分析「忠義軍與李全勢力的發展，對賈涉功業的影響最大。他對忠義軍採取利誘和分化的手段，在初期頗能得心應手，但隨著李全勢力坐大，裂土割據之心轉強之後，使賈涉窮於應付，竟致心力俱疲，……陷於難以掌握時勢的困境。」³³

二、關於楊妙真

在討論南宋金元之際山東紅襖軍領袖之一楊妙真時，學者的主要關注點在於其稱呼、下落、「行省」職務等問題。如陳高華、謝剛、張廣保、王頌和姜錫東皆分別有專論發表。

陳高華（溫嶺）在〈楊四娘子的結局〉中，根據元人柳貫〈于思容墓誌銘〉的記載，指出金末紅襖軍女首領楊四娘子（楊妙真），最後是投降蒙古政權的，在李壇從楊妙真處承襲益都行省問題的討論上，認為「《元史》卷二〇六〈李壇傳〉云：『太宗三年，全攻宋揚州，敗死，壇遂襲為益都行省，仍得專制其地』。這個說法不很準確，其實李全死後，楊妙真為益都行省，李壇是從楊妙真那裡承襲這一職位的。」³⁴ 趙儷生在〈楊妙真和唐賽兒〉文中對楊妙真的事蹟做了詳細敘述。³⁵ 謝剛的碩士論文「金末元初山東世侯李氏本末考」，對楊妙真的基本史料、事蹟，做了比較系統的梳理論述。³⁶

27 傅衣凌，〈宋元之際江淮商考〉，《傅衣凌治史五十年文編》（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1989），頁103-104。

28 黃寬重，〈經濟利益與政治抉擇——宋、金、蒙政局變動下的李全、李壇父子〉，《南宋地方武力——地方軍與民間自衛武力的探討》（臺北：東大圖書公司，2002），頁275-306。

29 姜錫東，〈宋金蒙之際山東楊、李系紅襖軍領導人及其分化考論〉，《中國史研究》2015.1: 163-184。

30 趙文坦，〈關於金末山東淮海紅襖軍的若干問題〉，《齊魯學刊》2011.1: 50-53。

31 趙文坦，〈山東的幾片摩崖石刻與宋金元之際紅襖軍故事〉，《齊魯文化研究》2012.12: 65-68。

32 陳智超，〈金末抗蒙（元）義軍的比較〉，收入《陳智超自選集》（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3），頁412-428。

33 黃寬重，〈賈涉事功述評——以南宋中期淮東的防務為中心〉，《暨南學報》2013.1: 101-113。

34 溫嶺（陳高華），〈楊四娘子的結局〉，《中國農民戰爭史論叢》第2輯（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0），頁503-506。

35 趙儷生，〈楊妙真和唐賽兒〉，收入《趙儷生文集》，頁476-492。

36 謝剛，「金末元初山東世侯李氏本末考」（上海：復旦大學碩士論文，1998）。

關於楊妙真的生卒年，《宋史》、《元史》都沒有記載，屠寄《蒙兀兒史記·李壇傳》推測不出窩闊台汗朝，陳高華曾有考證。陳高華反覆推敲耶律楚材〈答楊行省書〉，在〈《湛然居士集》中「楊行省」考〉一文得出結論，「神秘的『楊行省』，不是楊惟中，而是13世紀上半期赫赫有名的女強人楊四娘子。」³⁷在〈楊四娘子的下落〉一文中考證，《元史·李壇傳》的說法並不準確，「楊妙真自李全死後，即主持軍務。第二年，楊妙真到蒙古汗庭『入覲』之後，才得到大汗的正式任命，繼承李全的益都行省之職。此後她經常派人到汗庭。『奏事』和『進貢』，……楊氏『辭政』，應是指楊妙真後來將權力移交義子李壇。」³⁸

姜錫東在〈關於楊妙真的稱呼、生卒年和「行省」職務問題〉一文中，考辨楊妙真在「1215年成為紅襖軍領袖之後，被尊稱為姑姑、楊姑姑、李姑姑；1231年5月之後改稱楊妙真。妙真，顯然是楊氏正式信奉道教全真教之後的法號。」文中「推斷其生年為1195年；卒年為1252年或1252年之後。楊氏於1233年從海州北歸山東後，覲見蒙古窩闊台汗（元太宗），繼任『特進行山東淮南尚書省事』，直到1239年仍然在職；1252年離職，其子李壇繼任。學界所謂楊氏北歸『數年』即斃、即辭職之類的說法，都是欠妥的。」³⁹

王頌在〈牝雞司晨——蒙古女行省楊妙真生平考〉一文中，對相關的資料進行考述，得出以下結論：「楊妙真，淄、青州兩界堡人，生於金明昌二年前、後。當其兄安兒起兵遇害之時，其年齡約當二十五左右。」「無論滅金，還是攻宋，楊妙真都曾以蒙古大帥的副手參與其間；而其所任職銜，正是『山東淮南行省』。」⁴⁰張廣保在《金元全真教史新研究》第九章〈蒙元時期宗王、世侯對全真教的護持與崇奉〉，論述了「楊姑姑（楊妙真）與山東地區全真教、與丘處機的親信弟子之間，具有非同尋常的聯繫。」⁴¹

三、關於李壇

關於益都李壇的整體性、綜合性論述，多出現在通史性的著作中，上述著作主要仍是概述性的介紹，未有更深入的研究。⁴²

（一）國外相關著述

早在上個世紀40年代初，日本學者對益都李氏進行了開創性的研究。如井之崎隆興、愛宕松男、池內功、森田憲司等人均對這一問題進行過研究。

井之崎隆興在上世紀4、50年代先後發表〈元朝

37 陳高華，〈《湛然居士集》中「楊行省」考〉，《歷史研究》2000.3: 45-50。

38 陳高華，〈楊四娘子的下落〉，《元史研究論稿》（北京：中華書局，1991），頁422-424。收入王春瑜，《新編日知錄》（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2005），頁163。

39 姜錫東，〈關於楊妙真的稱呼、生卒年和「行省」職務問題〉，《東岳論叢》2013.8: 80-85。

40 王頌，〈牝雞司晨——蒙古女行省楊妙真生平考〉，原載《元朝史探索初集》，收入《西域南海史地探索》（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頁18。

41 張廣保，〈蒙元時期宗王、世侯對全真教的護持與崇奉〉，《金元全真教史新研究》（香港：青松出版社，2008），頁395-430。

42 白壽彝，《中國通史·元時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蔡美彪，《中國通史·宋遼金元時期》第7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德]傅海波、[英]崔瑞德，《劍橋中國遼西夏金元史907-1368年》（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韓儒林，《元朝史》上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頁244-245；周良霄、顧菊英，《元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頁254-266；李則芬，《元史新講》（臺北：黎明文化公司，1978）；周良霄，《忽必烈》（長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87）；劉迎勝，《元史》（香港：中華書局（香港）公司，1998）；李治安，《行省制度研究》（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0）；李治安，《元代政治制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李治安，《忽必烈傳》（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楊建新、馬曼麗，《成吉思汗忽必烈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張金鈺，《元代地方行政制度研究》（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1）；朱耀廷、趙連穩，《元世祖忽必烈傳》（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建立過程中的漢人世侯)和〈蒙古王朝統治下的漢人世侯——河朔地區與山東地區兩種類型〉二文，則主要從世侯對蒙古汗廷的政治傾向視角出發來展開分析，將漢人世侯分為忠誠型的河朔世侯和抵抗型的山東世侯，分析了這兩種存在形態之所以出現並存在的具體緣由，為進一步研究山東世侯李璿政權存在的政治形態提供了某種借鑒。⁴³

愛宕松男就極為關注漢人世侯問題，在〈李璿之亂及其政治意義：蒙古統治下漢地封建制向州縣制的轉化〉以漢人世侯李璿叛亂為切入點，分析了世侯問題的出現及其分布狀況，較為全面地考察了李璿叛亂給當時漢人世侯們帶來的影響，並從忽必烈確立中央集權州縣制度的角度分析其罷世侯的意義。⁴⁴

池內功氏先後發表〈蒙古經略金國與漢人世侯的成立〉系列論文，針對世侯的分布、附蒙年代、存在形態等問題，考察漢人世侯形成的全過程，並對愛宕松男的〈漢人世侯分佈表〉進行修訂和補充。為我們認識世侯益都李璿轄境的問題提供了不少有價值的資訊。⁴⁵

森田憲司〈李璿亂の以前——石刻かう今見金元交替期の山東地域社會〉，是其關於元代漢人知識人研究課題的重要組成部分，從石刻史料著手研究李璿之亂以前金元交替時期的山東地域社會。提出關涉李全、李璿研究方面基本史料存在的問題，通過明清、民國時期地方誌中的石刻資料分析李璿的統治及關於益都戰後處理狀況，進一步說明充分利用石刻材料可以彌補自李全至李璿這段歷史空白時期研究史料不足的問題。⁴⁶

(二) 國內相關著述

關於「李璿之亂」的研究。「李璿之亂」作為重大政治事件，在有元一代的政治書寫中佔有重要地位，元人神道碑、墓誌、行狀等個人傳記資料中都會被有意識地加以提及。「李璿之亂」是元初政壇上一件非常重要而又影響深遠的歷史事件，歷來被治元史者所重視，在上個世紀 80 年代掀起研究這一問題的高潮，並取得了相當豐碩的研究成果。

1980 年周良霄發表〈李璿之亂與元初政治〉一文，通過引用明代祝允明《前聞記》中關於李璿的珍貴史料，分析了李璿集團失敗的原因，指出李璿「之所以急不可待地起兵，原是想利用忽必烈與阿里不哥鑿兵，勝負不分的機會。」「忽必烈就頓時解除了北邊的威脅，從而可以集中全部軍力來對付李璿。李璿寡不敵眾，迅速失敗。」「促使李璿徹底失敗的根本原因還在於新建立的忽必烈政權，得到了漢族地主階級的普遍支持，具有為李璿所料想不到的穩定性。」以「李璿之亂」為分水嶺，「中統初元時，在忽必烈政權中，漢人官僚是不但不受歧視，而且是掌握最高實權的。」同時詳細分析忽必烈在追究和處置李璿集團問題時特別慎重和有節制。「忽必烈也表示不咎既往，繼續把他們當成漢人地主階級的政治代表而予以優容。這樣作，既收了地方軍閥的實權，消除了分裂和叛亂的隱患，同時又安定了漢人官僚，保持了蒙漢統治階級聯合專政的穩定。」「利用這一形勢，因勢利導，進行政治改革，加強中央集權。」此舉對元初的政治影響十分巨大。⁴⁷

43 [日]井ノ崎隆興，〈元朝成立過程における漢人諸侯〉，載《歷史教育》9.7 (1941)。井ノ崎隆興，〈蒙古朝治下における漢人世侯——河朔地區と山東地區の二つの型〉，《史林》37.6 (1954)。

44 [日]愛宕松男，〈李璿の叛亂とその意義——蒙古朝治下における漢地の封建制とその州縣制へ展開〉，《東洋史研究》6.4 (1941)。另載愛宕松男，《愛宕松男東洋史學論集》(第4卷元朝史)(東京：三一書房，1988)。

45 [日]池內功，〈モンゴルの金國經略と漢人世侯〉(1)，崗本三夫(編)，《創立三十周年紀念論文集》(四國學院大學文化學會，1980)。池內功，〈モンゴルの金國經略と漢人世侯〉(2)，《四國學院大學論集》1980.46。池內功，〈モンゴルの金國經略と漢人世侯〉(3)，《四國學院大學論集》1981.48。池內功，〈モンゴルの金國經略と漢人世侯〉(4)，《四國學院大學論集》1981.49。

46 [日]森田憲司，〈李璿亂の以前——石刻かう今見金元交替期の山東地域社會〉，見於森田憲司，《元代知識人と地域社會》(東京：汲古書院，2004)。

47 周良霄，〈李璿之亂與元初政治〉，載於《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1980.4: 115-12。

臺灣學者孫克寬〈元初李璿事變的分析〉一文比較客觀地分析了李璿事變的前因後果，認為李全李璿父子的割據局面與當時天下大勢有重要關係，對於王文統被殺和平定李璿之亂後漢軍的改制進行了重點探討。⁴⁸然而僅僅依靠《元史》中的資料側重於政治軍事方面的分析，顯然是不夠充分的。

歐陽琛在〈《元史·王文統傳》書後——略論元初統治集團關於「採用漢法」的鬥爭〉中對王文統「坐與李璿同謀伏誅」一事提出了質疑，認為此事純粹是一個假案；王文統之死和元初統治集團關於「採用漢法」的鬥爭有密切關係與影響。⁴⁹莊春波〈論李璿〉一文，將李璿其人及其活動放到民族矛盾和民族鬥爭處於主導地位的歷史條件下作了具體的分析和評價。認為，「『李璿之亂』是蒙古汗廷同地方諸侯割據勢力矛盾的結果，但更重要的它是民族壓迫激起的民族矛盾的產物，帶有反民族壓迫、民族歧視的正義性，不能以一般的割據叛亂視之。」⁵⁰

陳學霖、蕭啟慶、羅依果（Igor de Rachewiltz）合著《蒙元前期名人傳論》中視李璿為可汗麾下反叛和詭譎的官員，從李全和楊妙真生活的時代背景入手，較為系統地闡述了李璿在大蒙古國世官制度下發展壯大的歷史狀況。指出關於李璿事蹟的原始資料除主要依靠《元史》記載外，還可借鑒地方誌和碑刻資料。文中重點關注李璿和王文統的生平事蹟及忽必烈、李璿與王文統之間複雜的微妙關係；同時對於李璿之亂後，忽必烈處理與牽涉李璿案重臣的處理情況進行了探討，這對於我們認識

和深入研究「後李璿時代」益都走向問題頗有啟發。⁵¹

黃寬重在其〈割據勢力、經濟利益與政治抉擇——宋、金、蒙政局變動下的李全、李璿父子〉一文中，分析李全父子崛起於戰亂中，以個人的能力掌握情勢以求發展，迨其建立基業後，利用挾持要脅的兩面手法，依違於宋、金、蒙三國之間，擴大發展空間，攫取經濟資源，以建立其割據勢力。⁵²袁忠岩在其碩士論文「李璿兵變研究」中，主要考察李璿兵變這一歷史事件的背景、經過和結果的演變過程。以李璿事件為切入點，管錐南宋和大蒙古國對峙時期的社會歷史形勢，以及李璿兵變對蒙元歷史產生的深遠影響。⁵³張國旺〈元代張弘略事蹟考略——以張弘略墓誌和神道碑銘為中心〉，對李璿之亂問題有所涉及。⁵⁴

關於李氏與漢人世侯問題。金元之際益都李氏研究是與蒙元時期漢人世侯問題相關的重要研究領域。上個世紀50、60年代，孫克寬對漢人世侯問題進行了開創性的研究，相繼發表了〈蒙古帝國初期漢軍的建制〉、〈漢軍的分析〉、⁵⁵〈元代漢軍人物表〉⁵⁶三篇文章，強烈譴責張柔、史天澤等漢人世侯的民族氣節，認為正史撰寫家對李璿的評價有失公允，但作者所持觀點仍值得進一步商榷。

陳高華〈大蒙古國時期的東平嚴氏〉一文論述了山東世侯東平嚴氏集團的發展過程及大蒙古國對嚴氏的利用和控制，認為李璿佔領濟南，即等待東平嚴氏應援，並引用祝允明《前聞記》的記載，說明李璿兵變前李璿與嚴氏存在曖昧關係。李璿之亂平定後，忽必烈下決心

48 孫克寬，〈元初李璿事變的分析〉，《宋史研究集》第3輯（臺北：國立編譯館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1984）。

49 歐陽琛，〈《元史·王文統傳》書後——略論元初統治集團關於「採用漢法」的鬥爭〉，《江西師範學院學報》1980.2: 75。

50 莊春波，〈論李璿〉，《東岳論壇》1985.6: 6。

51 Chan Hok Lam, *In the Service of the Khan: Eminent Personalities of the Early Mongol-Yuan Period (1200-1300)* (Harrassowitz Verlag: Wiesbaden, 1993), pp. 501-538.

52 黃寬重，〈割據勢力、經濟利益與政治抉擇——宋、金、蒙政局變動下的李全、李璿父子〉，收入《南宋地方武力——地方軍與民間自衛武力的探討》，頁275-306。

53 袁忠岩，「李璿兵變研究」（蘭州：蘭州大學研究生學位論文，2010），頁8。

54 張國旺，〈元代張弘略事蹟考略——以張弘略墓誌和神道碑銘為中心〉，《西北師大學報》2014.6: 90-94。

55 收入孫克寬，《蒙古漢軍與漢文化》（北京：中華書局，1966）。

56 收入孫克寬，《元代漢文化之活動》。

解決「漢地」世侯問題。⁵⁷ 聶樹鋒、王秀瓏發表的〈史氏家族在真定——金元之交的漢人世侯剖析〉一文，則認為包括益都李瑄在內的漢人世侯在歷史發展中產生了消極和積極兩種作用，這些漢人世侯在蒙古政權轉變過程中所起的作用不可忽視。⁵⁸

趙文坦〈金元之際漢人世侯的興起與政治動向〉針對漢人世侯碑傳中頻頻出現的「盜賊」字眼，指出此種說法多是敵對集團之間的相互指責，認為李瑄部屬因對抗蒙古而湮沒無聞，遂難以詳知其家庭出身。⁵⁹ 並主要圍繞漢人世侯的征伐鎮戍情況考察漢人世侯與蒙元關係的演變，進一步指出益都李氏的情況比較特殊，其轄境與南宋接壤，李氏軍隊基本上屯戍在其轄境南部，軍民合一，是他擁兵自重，敢於反叛蒙古的重要原因之一。儘管如此，李氏也沒有形成足以與蒙廷相抗衡的氣候。元世祖在平定李瑄之亂後順利罷侯置守，與漢人世侯的征伐鎮戍關係甚大。⁶⁰

張金銑考察了包括益都李瑄在內漢人世侯的興起及分布狀況，分析了這些世侯的存在對華北地區政局及大蒙古國統治政策產生的影響，認為山東世侯相較河北世侯具有更強的獨立性，山東世侯與蒙廷的關係相對河北世侯相對疏遠些。⁶¹ 趙繼顏著有《金元之際山東三世侯》一書中第三部分極力貶斥李瑄的作亂行為，站在大蒙古國的立場上討論，稱李瑄是大蒙古國不斷作亂的益都行省。⁶² 符海潮則通過分析蒙元帝國控制漢人機制方面是以李瑄之亂為分水嶺，認為李瑄之亂後忽必烈對漢人世

侯的控制機制趨於完備。⁶³

關於李瑄叛亂與紅襖軍問題。先前研究紅襖軍的論著或將李瑄叛亂當作紅襖軍活動的一部分。⁶⁴ 錢君曄即持此觀點。趙文坦認為「這一論斷值得商榷。嚴格說來，當紅襖軍反抗金朝官僚貴族的壓迫和剝削時是義軍；當其被金廷招安後，即成為金朝的鄉兵；歸附南宋後，就成為南宋的忠義軍；投降蒙古後，則又變成了大蒙古國的地方武裝。」⁶⁵

關於益都行政建置的研究。陳高華在關於〈楊四娘子的下落〉指出，「蒙古進入中原之初，對歸附的漢人授以種種官職，其名稱一般均沿襲金朝之舊。『行省』即行尚書省事，為地方的最高職位。」⁶⁶ 溫海清在《畫境中州——金元之際華北行政建置考》一書的相關章節中對山東東路李瑄轄地變遷問題作出了相應的考述，得出的結論是益都李瑄領有山東東路之地，占地甚廣，因所處地域的特殊，畫境時除析出濱、棣兩州組成一路外，其餘基本未變。⁶⁷ 默書民〈元代的山東東西道轄區考析〉，益都路屬於山東東西道的監察範圍。⁶⁸

張金銑認為，李全、李瑄父子所佔據的山東東路地區，在蒙古國時期一直維持一種號稱「行省」的建置，其或稱「山東淮南楚州行省」，或稱「山東淮南等路行省」、「山東淮南尚書省」等，至李全死，李瑄襲職為益都行省，這從《齊乘》載「（至元）三年廢益都散府入本路」亦可窺知。蒙古國時期，益都地區雖一直留有一個行省稱號的存在，但並不意味著該地區就是行省之

57 陳高華，〈大蒙古國時期的東平嚴氏〉，《元史論叢》第6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頁1-23。

58 聶樹鋒、王秀瓏，〈史氏家族在真定——金元之交的漢人世侯剖析〉，《石家莊師範專科學校學報》2000.3: 61-67。

59 趙文坦，〈金元之際漢人世侯的興起與政治動向〉，《南開學報》2000.6: 53-60。

60 趙文坦，〈漢人世侯與蒙元關係的演變——以世侯征伐鎮戍為中心〉，《文史哲》2010.2: 130-136。

61 張金銑，〈漢人世侯的興起及其同蒙古汗廷的關係〉，中央民族大學歷史系《民族史研究》第5輯（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

62 趙繼顏，《金元之際山東三世侯》（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2004）。

63 符海潮，《元代漢人世侯群體研究》（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08）。

64 錢君曄，〈試論紅襖軍反金抗元起義〉，《天津師範學院學報》1961.1。

65 趙文坦，〈關於金末山東淮海紅襖軍的若干問題〉，《齊魯學刊》2011.1: 51-52。

66 陳高華，〈楊四娘子的下落〉，《元史研究論稿》，頁422-424。收入王春瑜，《新編日知錄》。

67 溫海清，《畫境中州——金元之際華北行政建置考》（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頁125。

68 默書民，〈元代的山東東西道轄區考析〉，《中國史研究》2007.3: 97-103。

建置，它更多地仍是一個路的建置。⁶⁹

關於李璫是否為漢軍萬戶的問題，有多位學者撰文研究。唐長孺、李涵〈金元之際漢地七萬戶〉，通過對相關資料的徵引，詳細考證，漢地七萬戶的身分構成、形成發展過程、職權範圍及其與大蒙古國之間的關係。主要圍繞當時山東的政治軍事形勢和李璫本身的力量與地位，進一步推測在蒙古滅金前後李璫被封為漢軍萬戶，對李璫封任萬戶缺少文獻記載的原因進行了探討，揭示李璫兵敗被誅，是導致漢地萬戶權力被剝奪的重要誘因。唐、李二先生考證的「七萬戶」是：劉黑馬、史天澤、蕭筍刺、嚴實、張柔、張榮、李璫。⁷⁰

黃時鑒對唐、李二先生的觀點提出了質疑，指出這一時期萬戶的設置是出於征金伐宋戰爭的需要，在漢人世侯中唯獨李璫並未參與滅金活動，其不能被授予萬戶稱號，因而亦不存在李璫被賜封為萬戶的記載，考證的「七萬戶」是：劉黑馬、史天澤、蕭筍刺、張柔、張榮、塔不已兒。否定李璫，增加一個塔不已兒。⁷¹王頌〈蒙古漢軍萬戶問題管見〉文中考證的漢軍「七萬戶」是：劉黑馬、史天澤、蕭筍刺、塔不已兒、張進、郭德山，另一人不明，亦否定李璫。⁷²

對於這一問題，趙文坦針對窩闊台時期的萬戶之役，認為「成吉思汗時期的漢軍官制沿襲金朝的制度。窩闊台即位伊始，用蒙古軍的編制和官稱改編漢軍，設立漢軍『三萬戶』，分統漢軍」。「『七萬戶』的封授既不是出於對漢人世侯實力的認可，也不是出於滅金戰爭的需要，而是對蒙金三峰山戰役中立有卓著功勳的漢軍將領的論功行賞。事實上，漢人世侯自隨蒙古軍征金

起，其職守升遷的依據即是軍功。《元史》內漢人世侯列傳中諸如『論功』、『錄功』、『上功』、『計功』之類的字眼即可說明這一點。」李璫並未參與蒙金三峰山戰役，自然也不會別授予萬戶。⁷³胡小鵬對金元之際漢軍萬戶問題進行了較為深入的探討，亦否定了李璫為漢地七萬戶之一的說法。⁷⁴吳志堅對大蒙古國時期諸路課稅所的基本職能，課稅所與諸王、世侯的關係等方面問題進行闡述，認為益都課稅所重點在於控制鹽業，燕京行省對益都課稅所的控制也相對嚴密。⁷⁵

關於「後李璫時代」元代對山東地區的統治，學界的研究主要從軍事的角度切入，進而論及對益都的善後處理問題。村上正二〈關於元初監戰萬戶的設置〉指出，李璫之亂後，元廷對漢軍的萬戶削權採取了以下措施：設奧魯，奪管民權，禁止自命屬官，元廷派遣怯薛衛士擔任漢軍監戰萬戶，滅宋後，又在漢軍萬戶上設達魯花赤監臨。⁷⁶吳秀永、牛頌、何平認為，全國統一後，元廷對漢軍重新進行了編組。由於有探馬赤軍屯戍山東，山東漢軍等大多鎮戍長江以南各省，只有少數軍隊留在江北。在元王朝的軍隊中，漢軍佔有相當大的比重，處於舉足輕重的地位。⁷⁷史衛民分析漢軍的來源和作用時指出，金末漢地地主武裝是元代漢軍四個來源之一，漢軍在對金、宋戰爭和鎮戍江南，保證國家統一方面的作用不可忽視。⁷⁸這些研究讓我們看到，忽必烈在削平益都李璫勢力之後，隨即收編益都漢軍進行重新編組，李璫故舊將吏被調離山東，派遣駐守江南。但對於益都李氏集團的具體處理情況未作進一步探討。

劉曉兩篇論文則對益都李璫舊軍處置情況有所揭

69 張金鈺，《元代地方行政制度研究》（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1），頁65。

70 唐長孺、李涵，〈金元之際漢地七萬戶〉，《文史》第11輯（北京：中華書局，1981）。

71 黃時鑒，〈關於漢軍萬戶設置的若干問題〉，《元史論叢》第2輯（北京：中華書局，1983），頁43-52。

72 王頌，〈蒙古漢軍萬戶問題管見〉，《元史論叢》第4輯（北京：中華書局，1986），頁59-70。

73 趙文坦，〈《元史·劉黑馬傳》「七萬戶」蠡測〉，《歷史研究》2000.6: 26-32。

74 胡小鵬，〈窩闊台汗己丑年漢軍萬戶蕭筍刺考辨——兼論金元之際的漢地七萬戶〉，《西北師大學報》2001.6。

75 吳志堅，〈大蒙古國時期諸路課稅所職能及其「地方化」問題〉，《內蒙古社會科學》2002.1: 67。

76 [日]村上正二，〈關於元初監戰萬戶的設置〉，《東方學報》（東京）11卷，1940.1。

77 吳秀永、牛頌、何平，〈中國全史·中國元代軍事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頁123。

78 史衛民，〈元代的軍隊〉，《文史知識》1985.7。

示。〈元鎮守平江「十字路萬戶府」考〉一文指出按蒙古「父子罪不相及」的傳統，李璫諸子很有可能在元朝繼續做官，平江十字路萬戶府萬戶李希靖很可能是李全後人。⁷⁹ 在〈元鎮守杭州「四萬戶」新考〉一文中，則對益都李璫舊軍的編制和番號作了十分細緻而深入的考辯，認為益都舊軍萬戶府為杭州四翼萬戶府軍之一。萬戶鄭祐為金末紅襖軍李全部將鄭衍德之孫。至元六年，張弘範出任「益都淄萊等路行軍萬戶」，掌管「李璫舊軍」。張弘範益都淄萊軍發展為數個萬戶後，未再繼續留用原「益都淄萊」番號，李恒所部由此去「新軍」兩字，改為益都淄萊萬戶府。⁸⁰ 陳廣恩〈元益都諸萬戶府考〉指出「元代漢軍萬戶府中共有 13 個以益都為名號的萬戶府組織，其中多名異實同，實際只有益都淄萊等路行軍萬戶府、益都新軍萬戶府（2 個）、益都舊軍萬戶府、益都淄萊新軍萬戶府等 5 個萬戶府建制。」「全國統一之後，各翼萬戶府北撤至沿江重鎮或省會如杭州、建康、龍興等地駐守。各萬戶府軍事任務及鎮戍地的變動，是元朝不同時期戰略目標變化的體現。」⁸¹

結 論

總的來看，關於益都李氏家族活動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尤其是周良霄、愛宕松男、池內功、森田憲司等學者用力較深，有一系列成果問世。但是關於益都李氏研究尚有不盡如人意之處。一方面，概括性介紹多，專題性研究少，很多課題是仍然有待更深入的研究。關於李全歸而復叛的原因、楊妙真下落及「行省」職務、「李璫之亂」的成果相對豐富，對於李璫轄區地方行政建置的變遷、益都李氏與北方漢人世侯的關係、益都李氏在北方漢人世侯中的特殊地位、山東世侯與蒙古東道諸王之間的關係方面研究較少，尤其是「後李璫時代」元代在山東地區的統治狀況，目前學界關注尚不夠。如「李璫之亂」後益都的走向，「後李璫時代」山東地區的統治政策、統治機構的演變以及對山東世侯的處理問題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也是十分有限的。最後，需要指出的是，山東地區作為一個重要的區域其地方政局對元代中央政局產生了的重大影響，引入一種區域史的理論視角是有必要的。

79 劉曉，〈元鎮守平江「十字路萬戶府」考〉，《隋唐遼宋金元史論叢》第3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80 劉曉，〈元鎮守杭州「四萬戶」新考〉，《浙江學刊》2014.4: 36-44。

81 陳廣恩，〈元益都諸萬戶府考〉，《史學月刊》2015.6: 47-55。

漢學研究中心「外籍學人來臺研究漢學獎助」申請須知

- ※ 本中心獎助國外大學和學術機構之外籍漢學研究學者來臺研究
- ※ 提供經濟艙直飛來回機票乙張及每月研究補助費
- ※ 提供在臺獎助期間意外傷害保險新臺幣一百萬元（附加意外傷害醫療保險）
- ※ 研究期限：三個月至一年
- ※ 申請文件：1. 申請表 2. 簡歷表（含著作目錄）3. 研究計畫 4. 推薦函至少一封
- ※ 截止日期：2017 年 5 月 31 日（提出 2018 年 1 月至 12 月研究申請）
- ※ 如欲了解詳情，請洽漢學研究中心學術交流組或上網查詢申請
地址：臺北市中山南路 20 號 電話：886-2-23147321 Fax: 886-2-23712126
E-mail: ccsgrant@ncl.edu.tw http://ccs.ncl.edu.tw